

# 屈原生活时代初探

韩桓德

屈原约生于前三三九年(楚威王元年),卒于前二七八年(楚顷襄王二十一年)。关于他的生年,他自己在《离骚》里曾说过:“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”据此,不少前辈学者用不同的历法推算,引起了一些争议。尽管如此,一般都集中在前三四三年(楚宣王二十七年)至前三三九年(楚威王元年)这四年间,其中以浦江清先生推算屈原的生年为前三三九年,至为详审精当,为学者们所公认。<sup>①</sup>至于他的卒年,也有些争议,一般都采用王夫之的说法,即卒于前二七八年(楚顷襄王二十一年)。<sup>②</sup>屈原活了六十二岁。他生活的时代,正是战国中、后期,他历经楚威王、怀王、顷襄王三个朝代,但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时期,主要集中在怀王当朝三十年间。他是位杰出的政治家、改革家,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,在历史上有他特殊的地位。

屈原生活的时代,是七个诸侯国之间矛盾斗争最为复杂尖锐的时期,通过多次大规模的兼并战争,彼此力量的消长,起了明显的变化。北方最强大的魏国被新兴的秦国所挫败,逼着魏迁都大梁,当时能和秦抗衡争长的齐国,也不敢劳师远伐了,其他韩、赵、燕等国则更无力量抗衡,成为被争取的与国。这个时期斗争的焦点乃是秦、楚争强,其胜负完全取决于自己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。屈原主张对内实行政治改革,对外联齐抗秦,以富国强兵,振兴楚国,从而达到由楚统一天下的目的。他这种伟大的抱负和进步的主张,既有历史的经验为借鉴,又有社会现实为依据。在这历史转变的战国时期,就国内来说,新兴地主阶级同贵族领主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大决战的阶段,斗争的焦点是夺取政权。就对外来说,在弱肉强食的情势下,特别是小诸侯国随时有被吞灭的危险,因而摆在各诸侯国面前最为突出的问题,就是必须迅速地进行以变法为内容的内政改革。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篇曾举“刻舟求剑”的故事,竭力辩明变法的好处,不变法的坏处。指出“世易时移”必须坚持变法的必要性,否则要治理好国家是很难的,并以“守法而弗变则悖”“荆(楚)国之为政”作为教训。因此,只有坚持变法,才能图强;只有坚持改革,才能图存,最终实现统一天下的目的。这一点,早在屈原之前一些思想家、政治家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,在魏国有李悝,韩国有申不害,赵国有慎到,燕国有乐毅,齐国有邹忌,楚国有吴起,秦国有商鞅等,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以变法为内容的内政改革。尽管各国的条件和情况不尽相同,但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振兴和富强。兹举影响较大的秦、楚变法比照如下:

秦国地处西北部，原是个落后的诸侯国。前三六一年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，开始兴盛起来。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：“开阡陌封疆”（即废除井田制），“教民耕战”（即奖励力耕力战），其结果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司马迁对商鞅变法作了充分的肯定，谓秦孝公“行之十年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》谓孝公行之十八年），秦民大悦。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”<sup>③</sup>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局面。

商鞅变法施行的过程中，尽管改革势力超过了贵族势力，但是斗争还是很激烈的。前三四六年，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破坏变法，商鞅对他俩分别施以劓刑和脸刺，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。当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公子虔则诬告商鞅谋反，秦惠文王便车裂了商鞅。商鞅本人虽然被杀害，但商鞅变法依然存在，它的成功与深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。秦始皇时相国李斯曾说：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；民以殷盛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。”<sup>④</sup>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，相继的秦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襄王到秦始皇，都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，坚持变法图强，改革内政，从而使秦国成为诸侯中最强盛的国家，造成了许多有利于实行统一中国的优厚条件。

楚国地处南方，春秋以来就是个强盛的国家，到了战国中期，逐渐由强盛开始转向衰败，经常受到邻国韩、赵、魏攻伐的威胁。约早于商鞅变法二十三年（前三八二年）前的楚悼王便任用吴起变法。变法的原因是因为楚王朝“大臣太重，封君太众。若此，则上偪（逼）主而下虐民，此贫国弱兵之道也。”<sup>⑤</sup>对此，吴起提出“明法审令，捐（裁汰）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（废除公家私属的供养例分），以抚养战斗之士。”<sup>⑥</sup>要在强兵，“厉甲兵以时争天下”，以达到统一天下之目的。施行的结果“南平百越，北并陈、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。”虽不免有些夸大，但变法效果是明显的。吴起变法的矛头所向是针对当时把持朝政的旧贵族和重臣的。正因为如此，“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”。吴起变法伊始就遭到了以屈原白为代表的旧贵族的反对，指责吴起“变其故而易其常”，指责悼王“逆天道”，任用吴起将助逆成祸，当面辱骂吴起为“祸人”。他们藉悼王死的机会诬告吴起谋反作乱，用乱箭把他射死支解了。这样，吴起变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以失败而告终。

半个世纪以后，继吴起变法之后的屈原又实行变法。屈原本是楚王的同姓贵族，屈、昭、景是楚国王族三大显赫的姓氏，屈氏的子孙如屈重、屈完、屈建、屈匄等在楚朝廷曾多任要职。但到屈原时代屈氏已经衰落，政治地位就不如前显赫了。屈原自己也说：“忽忘身之贱贫”（《惜诵》）。这就使他的目光转而注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局。他所处的时代，又是诸子蜂起、百家争鸣的时代。从他诗歌中也可以看出，他受到当时儒家、法家进步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。他青年时就显示出“博闻强识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的经世英才，他对时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目睹当时的时局，外有强秦压境，蚕食吞灭的危险，内有旧贵族集团把持朝政，他们竞相贪婪，不恤朝政，把国家弄到“幽昧”“险隘”的地步。为此，屈原认为在内政上必须彻底改革，刷新朝纲，修明政治，以富国强兵；在外交上联齐善韩，挫败强秦，由楚实现统一天下。为了振兴楚国，他“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”，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导夫先路！”（《离骚》）甘愿辅佐君王，使国家走上正道。怀王早期还能励精图治，他任命屈原做左徒（约在怀王十一年——十六年之间），并同屈原一起密谋变法，改革内政，振兴楚国，却遭到了朝廷旧贵族和重臣的阻挠破坏，屈原本人也遭到了他们的中伤而被怀王疏远（免去“左徒”职务）。据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记载：

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令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（夸耀）其功曰：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”。王怒而疏屈平。

“宪令”，即法令，是国家的根本大法。上官大夫为什么要“见而夺之”？屈原为什么又“不与”呢？这里的“夺”字，是上官大夫对屈原施加政治压力，强为修改“宪令”条款而言，屈原绝不允许上官大夫这种作法。屈原草拟“宪令”，是继承了“楚邦之法，禄臣再世而收地”<sup>⑦</sup>的作法，和吴起变法一脉相承，其中肯定有取消贵族、重臣特权的条款，屈原也因此而获祸。屈原与上官大夫“夺稿”的斗争，决不能看成是争宠害能的斗争，而是一次新旧势力严正的政治斗争。由于屈原势孤力薄而怀王又被强大的贵族势力所包围，于是屈原被疏远了。屈原变法又以失败而告终。屈原追述当时的斗争情形：

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齟怒，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难离别兮，伤灵脩之数化。（《离骚》）

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媿（媿）。……弗参验以考实兮，远迁臣而勿思。信谗谀之混浊兮，盛气志而过之。（《惜往日》）

这使屈原是多么痛心！如果说吴起变法是关系到楚国富国强兵的话，那么屈原变法便关系到楚国的存亡，关系到整个楚国的命运。

变法是一场新旧势力的大搏斗，秦国新兴势力强大压倒了旧贵族势力，所以变法得到了成功。楚国旧贵族势力强大，所以吴起和屈原先后两次变法都以失败告终。这对秦、楚争强来说，定是秦强楚弱。

## 二

战国中期，七个诸侯国通过大规模的兼并战争，彼此力量消长，已有了明显的变化。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，只有东方的齐，南方的楚，西方的秦三国势均力敌，相互对峙。就实际情况看，当是秦、楚争强。“秦之所害天下者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楚弱则秦强，此其势不两立。”（苏秦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崛起淳兴，是诸侯中最强盛的国家，大有吞并各国之势，直接威胁到山东（崤山、函谷关以东）六国的安全，于是在外交战线上则开展了新的攻势。山东六国把南北联合起来，组织联合阵线共同抵御西边的强秦，所谓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，叫做“合纵”。就秦国对山东六国来说，迫使六国各自向秦国进行妥协和归顺，所谓“事一强以攻众弱”，叫做“连衡（横）”。

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两条阵线的出现，是取决于当时的斗争形势。所谓“非从（纵）即横，横成则秦帝，从成即楚王。”<sup>⑧</sup>苏秦对楚王说：“从（纵）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横合楚则割地以事秦。”<sup>⑨</sup>因而秦、楚在“连衡”与“合纵”中的地位是头等重要的。秦国在讨伐魏国，攻打韩国和赵国，孤立齐国之后，再进攻楚国，已成为必然的趋势。山东六国最大的国家是楚国和齐国。楚、齐果真能联合起来，那就能抵御强秦的入侵，而其他如韩、赵、魏、燕等国要想抵抗秦国的吞并，就必须依赖楚国和齐国的联合，以保持暂存的地位。例如前三一八年以楚怀王为领导，和前二九六年以齐湣王为领导，联合其他国家先后向秦国进兵讨伐，迫使秦国“攻城”、“略地”的野心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。约在怀王十六年前不久，屈原在左徒任上，是坚决主张联齐抗秦的。他是“合纵”坚定的支持者和贯彻者，刘向《新序·节士》篇记载：“秦欲吞灭诸侯，兼并天下。屈原为楚东使于齐，以结强党。”经过屈原的努力，楚、齐终于订了盟约，联合起来了。这使秦王最为害怕，想方设法去破坏拆散这个联盟。前三一三年（秦惠文王十二年），秦国打算去讨伐齐国，可是齐国和楚国已订了“合纵”的盟约，秦惠文王很忧虑这件事，于是就派张仪到楚国去进行阴谋活动。张仪对楚王说：“秦国十分憎恨齐国，齐国与楚国亲善结盟，楚国如能同齐国断交的话，秦愿意把商於六百里的土地献给楚国。”楚怀王爱贪便宜，

轻信张仪的假话，就同齐国断绝了友好关系，并派遣使者到秦国去接受献地。这时张仪狡诈抵赖说：“我和楚王约定六里，没听说六百里。”楚使气愤归报楚王，怀王大怒，便兴师去讨伐秦国，秦军迎战于丹、浙，大败楚军，斩首八万，虏获楚将屈匄，侵占了楚国汉中大片土地。<sup>⑩</sup>这是楚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错误。

在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两派势力均衡的形势下，在争取与国方面，就成了双方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。韩国和魏国在与国中的地位尤为重要。“秦之争天下在韩魏”（王应麟）。魏曾是北方的强国，对秦向东推进是一大障碍，所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，首先考虑如何削弱魏国。同样，韩国也是秦国向东推进的障碍，在依次攻韩攻赵的同时，想方设法争取魏国，孤立东方的齐国，企图打通一条向东推进的通道，转而集中力量攻打楚国。楚怀王二十八年（前三〇一年）秦国联合齐、韩、魏攻打楚国长达五年之久，取宛叶以北。这表明秦国在争取与国方面是成功的。同样，争取韩、魏对楚国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对此，屈原比较有明确的认识，他联齐抗秦的主张，自然包括联齐善韩在内。韩与楚相邻，假如韩、魏被争取为楚国的与国，就能阻止强秦向东推进，联合山东诸国打败秦国，以达到由楚国实现统一六国之目的。但是楚国在争取与国方面远远不及秦国。这也是楚国外交路线不坚定的表现。

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两条阵线斗争的胜负，是取决于诸侯各国的外交路线的正确与否。秦国自孝公以来到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他们一直坚持“连衡”的阵线，始终采取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。具体说来，首先考虑如何对付北方最强盛的魏国，然后依次进逼赵国和韩国，对相距甚远的齐国则采取友好结交的政策，从而达到孤立齐国、挟制楚国，转而集中全力挫败楚国。由于秦国长期坚持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，至秦始皇即位前已兼并了大片土地，由秦统一六国的趋势已水到渠成，于前二二一年，秦始皇终于实现了统一六国的目标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大帝国。但是秦国在兼并战争过程中，往往采用暴虐手段，大肆杀戮和驱逐百姓，据记载，前二九三年秦将白起在攻打韩、魏国的伊阙战争中，则“斩首”数二十四万级。面对暴秦，屈原等人骂“秦为虎狼之国”，反映了山东各国人民特别是楚国人民普遍对秦愤慨的情绪。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谣谚，则集中反映了这种情绪，因此山东六国人民都不愿意做秦民。此后，秦虽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王朝，但在暴秦的压迫下，人民便把这句谣谚变为反秦的力量。秦末农民革命领袖陈涉、吴广便揭竿而起，一举推翻了统治不过十五年的秦王朝。但有人认为，反对秦国的暴虐手段，也就是反对秦国的统一。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，我们不应该把它混淆起来。也有人认为，屈原主张联齐抗秦，就是反对秦国统一中国，是逆转历史的作法。那更是值得商榷的。

楚国以怀王为首的当权者，在对外政策上始终是依违不定、反复无常。在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的斗争中，楚国时而联齐抗秦，时而背齐和秦，摇摇摆摆。如前所举，怀王十六年（前三一三年），楚与齐结成联盟，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诳骗楚王，结果楚国兵挫地削吃了大亏。又，怀王二十七年（前三〇二年），楚太子因私斗杀死了秦大夫逃回楚国，秦王以此为藉口，联合齐国、韩国、魏国攻打楚国，杀楚将唐昧。再，怀王二十九年（前三〇〇年），秦国又进攻楚国，杀楚将景缺。上述事例足以表明，楚国在外交政策上是陷于孤立的状态之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怀王不得不使太子到齐国去作为人质，并起用屈原再次到齐国去重修旧好。“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，以至于此，于是复用屈原。屈原使齐。”<sup>⑪</sup>这时楚国才又回到联齐的路线上来。楚国采用这种摇摆依违、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，固然与怀王那种浮躁而无远见分不开，但尤为重要是楚朝廷内部有以怀王儿子子兰、宠妃郑袖、重臣上官大夫为代表的亲秦投降派，他们坚持“亲秦远齐”的外交路线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保持个

人权势和禄位所致。对此，屈原同他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在《离骚》中指出：“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”“民好恶其不同兮，惟此党人其独异。”“余以兰为可恃兮，羌无实而容长……椒专佞以慢愎兮，糝又充夫佩帙。”深刻地揭露了他们无耻的行径。屈原是坚定地执行和贯彻“合纵”路线的，并曾先后两次出使齐国以结友好，共同抵抗强秦。事实表明：当屈原在朝时，那联齐抗秦的“合纵”政策就能得到贯彻，秦国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反之，楚国的外交政策就失败。由于屈原力单势孤，在强大的旧贵族集团反动势力的包围下，他那种联齐抗秦的外交主张是无法实现的。

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是诸侯间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，也是秦、楚争强图谋实现统一六国的斗争。秦国坚定不移地坚持“连衡”的外交路线，有步骤、有目的地逐步吞并山东六国，这是条行之有效的路线。因为山东六国间矛盾太多，处于领导地位的楚国和齐国常常动摇不定，加之朝廷内部旧贵族的阻挠破坏，是一定要失败的。

### 三

春秋末战国初，宗族领主制已分崩离析，新兴地主阶级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，如韩、赵、魏三家卿大夫分晋，齐国卿大夫田氏夺取了齐国政权等，就是明显的例子。他们以变法图强、改革内政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形式，以达到割据称雄进而图谋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。早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由五十多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，兼并成十三个国家，到了战国中期又兼并成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韩、魏、赵七个大的诸侯国，形成七国并立争雄的局面。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统一的趋势。诸侯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统一的形式。例如前三三三年，号称中兴之主的楚威王率兵在徐州挫败了齐国，秦国趁机救魏，占领了魏的大片土地。此后，又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，彼此力量消长，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，就形成齐、秦、楚三国并峙的局面，韩、赵、魏、燕便成了被争取的与国。韩自立国以来，就被魏秦两国所击败；赵国自成侯以来，也屡败于魏、秦；魏国自惠王以来，东败于齐，西丧地于秦，南又败于楚。齐、楚、秦三国势均力敌，不相上下。比屈原稍早的孟轲在回答梁襄王时就道出了天下“定于一”的愿望，至屈原生活的时代，这种统一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化。

战国时期，诸侯各国之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，又给广大人民（特别是农民）带来深重的灾难，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”形成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”阶级对立的局面。面临这个灾难深重的现实，“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”，到了“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”（以上皆孟轲语）无以为生的境地。屈原在诗歌里慨叹“民忧”、“民艰”、“民离散”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的思想。为此，广大人民要求尽早结束战争，要求过和平生息的日子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在连续不断战争兼并过程中，大小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也异常突出，小的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，只得依附或归顺于大国，暂时赖于生存。因此，他们也希望尽早结束战争，实现统一的愿望。

结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，实现统一全中国，乃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的重大使命。问题在于由谁来实现统一天下的任务，用什么方式统一？齐、楚、秦三大国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条件。

齐国地处山东半岛，北临渤海和燕国接壤，西与赵国毗邻，东临黄海，地理形势优越，对防御战来说，易守难攻。齐国盛产鱼盐，是最富庶的国家。商业发达，国都临淄是个大商

埠，《战国策·齐策》记载当时临淄的盛况：“车毂击，人摩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如雨。”生动地描绘了临淄一派繁华的景象。早在春秋时期，齐桓公曾一度称霸诸侯，齐威王、宣王时声威也远远超过秦国，齐湣王继楚怀王还做过“纵长”，曾两次联合韩、魏攻打秦国。为什么齐国不主动地去实现统一六国的任务，最后反被秦国所吞灭呢？孟轲对齐宣王曾指出：“王之不王，不为也非不能也。”<sup>⑩</sup>这是因为齐国最高统治者执行一条保守偏安的路线，错误地认为和秦国相距甚远，存有侥幸的心理，以观秦、楚之争斗，而坐守渔利之便。齐朝廷既不坚持内政改革，又不图谋去实现统一六国的目标。齐王却兴修百亩之地的宫殿以供享乐，而那些贵族“无不吹竽鼓瑟，击筑弹琴，斗鸡走犬，六博踰鞠者”，<sup>⑪</sup>终日沉缅于游乐声色之中，造成百姓“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”的政治局面。由此必然导致灭朝覆国，最终于前二二一年为秦所灭。

楚国地处江淮、长江中下游。它的版图在诸侯国中最大，相当于六国土地的总和。西到湖南沅陵县和四川巫山县，东到江苏、浙江，南到湖南道县，北到河南新郑县和陕西洵阳县。沃野千里，物产丰富，农业、手工业都很发达。“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。”（司马迁）对于足食强兵来说，是非常有利的。楚国的军队号称百万，有车千乘，骑万匹，是骑兵最早的建制者。士卒勇敢善战，一往无前。前线指挥官如吃了败仗，不问主客观原因，便缚手待罪，死而无憾。屈原在《国殇》中描写了楚国的将领和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仍然奋勇杀敌，“带长剑兮挟秦弓，首身离兮心不惩。”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”集中反映了楚民族勇武刚毅的性格和为国牺牲的精神。

据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记载右尹子革说：“昔我先王熊绎，辟在荆山，筭路蓝缕，以处草莽，跋涉山林，以事天子。”自熊绎艰苦创业以来，春秋战国期间就统一了几十个国家，融合了不少兄弟民族，它在开发经营江汉流域、实现民族融合统一等方面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苏秦对楚威王说：“楚天下之强国也……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陜塞、郢阳，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”<sup>⑫</sup>如果楚国当朝统治者能够积极地变法图强，改革内政，对外实行联齐抗秦，充分利用上述这些优越的条件，那么实现统一天下之目标是毫无疑问的。屈原主张由楚统一天下是有充分依据和条件的，他这种统一的宏愿，在《离骚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等作品中，都表明了这种憧憬。《离骚》中“所称的‘前王’、‘前圣’如尧、舜、汤、禹都是前代统一的帝王，如摯、咎、繇、付说、吕望都是前代的‘王佐’；如齐桓、宁戚，也是‘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’的霸业的完成者及其辅佐者，威力所及，也不限于一个国家。”<sup>⑬</sup>同样，他在《大招》（应为屈原作）结尾一段：“雄雄赫赫，天德明只！三公穆穆，登降堂只！诸侯毕极，立九卿只！昭质既设，大侯张只！执弓挟矢，揖辞让只！魂乎归徕，尚三王只！”这是屈原为楚怀王客死于秦，归葬于楚时作的招魂歌，诗中表明了应由楚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愿望。屈原对内实行改革、对外联齐抗秦的主张，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。为什么楚国不但没有统一天下反被秦所灭呢？这是因为旧贵族集团把持朝政，他们执行一条“亲秦远齐”的投降路线，而楚王又昏愤荒淫，造成朝政腐败，政治黑暗的局面。对此，屈原在作品中指出：

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岂余身之偷乐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……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。羌内恕己以量人兮，各兴心而嫉妒。……固时俗之工巧兮，偃规矩而改错。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。（《离骚》）

皇天之不纯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。民离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东迁。（《哀郢》）

变白以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。凤凰在笯兮，鸡鹜翔舞。同糅玉石兮，一概而相量。夫惟党人之鄙固兮，

羌不知余之所臧。 《怀沙》

形象地揭露了那班贵族的罪恶行径。在这里，还可引楚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二七八年）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城时说的一段话：

是时楚王恃其国大，不恤其政，而群臣相妒以功，谄谀用事，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，城池不修，既无良臣，又无守备，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，多倍（掎）城邑，发梁焚舟，以专民心，掠于郊野，以足军食。当此之时，秦中士卒，以军中为家，将帅为父母，不约而亲，不谋而信，一心同功，死不旋踵。楚人自战其地，咸顾其家，各有散心，莫有斗志。是以能有功也。 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

足见楚国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何等黑暗腐败！正因如此，于前二二三年，为秦所灭。

秦国地处西北部，自秦穆公霸西戎就奠定了基业，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，秦国便由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最强盛的国家，逐渐向东边、西边转而向南进行兼并战争，夺取了魏国黄河以西的七百里土地之后，击打蜀国，夺取南郑，接着便灭掉蜀国（今成都市）和巴国（今重庆市），不仅开拓了疆域，而且得到了丰富的资源。“取其地足于广国，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。”（司马错）就地理形势看，北有上郡甘泉、谷口坚固的要塞，南有泾、渭流域肥沃的土地，并占有四川、汉中地带，东有黄河与函谷关，有“天府雄国”之称，地势险固，宜于防御和出击。秦国的百姓“力耕力战”，有很好的民俗。荀卿曾到过秦国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，官吏的忠实，大官的守法，朝廷的清静，认为是最好的政治，<sup>⑩</sup>造成了许多优厚的统一中国的条件。前二二一年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结束了八百年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。毛泽东同志指出：“如果说，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，那么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”<sup>⑪</sup>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：屈原生活的时代，是以变法为主要内容的太改革、大转变的时代，是外交战线上展开“合纵”与“连衡”两条阵线斗争更为复杂尖锐的时代，同时又是由割据称雄逐步走向统一的时代。这个时代对屈原的进步思想和主张都有直接的影响。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。

注释：

- ① 浦江清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《历史研究》1954年第一期
- ② 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
- ③ 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
- ④ 李斯《谏逐客书》
- ⑤ 《韩非子·和氏》
- ⑥ 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
- ⑦ 《韩非子·喻老》

⑧ 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

⑨ 《战国策·楚策》

⑩ 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

⑪ 刘向《新序·节士》

⑫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⑬ 《战国策·齐策》

⑭ 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

⑮ 詹安泰《屈原》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

⑯ 参看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

⑰ 毛泽东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